

我的留学记

中华书局



吉川幸次郎

目 录

总序	1
译者前言	1

一 我的留学记

留学之前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3
在尊重西欧的风潮中	6
京都学界与清末古典学者的接触	9
与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的交往	11
被中国文学的“日常性”所吸引	16
清朝的学问与欧洲近代思想	21
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力行	25
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和纤细的魅力	28
中国研究在京都大学的位置	31
对现代中国的关心	33
了解中国的一切	36

初次到中国：江南的辉煌和富裕	39
----------------------	----

留学期间

种种幸运	44
到达北京之前	47
延英舍——寄宿的日常生活	50
整日埋头于语言学习	54
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	57
张作霖的北京撤退——北京大学的复兴	60
转变期的北京大学	63
大学、学派、学者——激烈的对立	67
黄侃给予我的感动	72
与书店打交道，在北京大学听课	78
剧院·饭店·名胜古迹	82
到江南——我被当作中国人	86
留学收获	92
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96

二 中国印象追记

雷峰塔	103
C教授	107
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112
琉璃厂后记	116
南京怀旧绝句	120

高邮旧梦	125
购书怀旧绝句	130
《雨窗欹枕集》和我	132
柳絮漫话	135
随笔三篇	140
中国的警察	144
法隆寺的松	147
中国思想史上的人	150
中国人与法则	152
中国人与宗教	156
中国人的幻想力	160
两个中国——中国的城市与农村	164
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	173

三 中国文学论

中国文学史之我见	197
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	212
中国文学所体现的人生观	226
中国文学的政治性	233
史传的文学	243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	248
中国的文学革命	251
后 记	262

总序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1879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横滨，抵东京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并将此次东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

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扶桑游记》序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上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订新学制，设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甲午战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 13 人的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的序幕。至日俄战争时的 1905 年前后，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高达八千人之多。与此同时，官绅及各地人员到日本游历、考察也蔚然成风，一时间，狭长的岛国日本，尤其是弹丸之地的东京东京汇集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其中一些人还写下了考察日记或游历记，如：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务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澄《东游日记》、王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景禧《日游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或游记通常被称为“东游日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竭毕生精力收集这些游记，仅

其个人收藏的就多达 227 种,其中晚清的 148 种,民国时期的 79 种。战争期间,为避免民间的贵重文献毁于战火,东京东京都教育局制订了“战时特别征收图书”制度,实藤将包括这 227 种游记在内的四千余部个人藏书全部贡献了出来。这些“东游日记”如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里。

多年来,我国在“东游日记”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早在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就收录了《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九十年代以后,又有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后来改题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问世,为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中国人留下了众多的“东游日记”一样,近代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专著多达数百部,其中以作为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 1980 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截止至 1979 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其实正如此书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由此可以察知,这些游记的数量之多。而且,仅就该文库收藏的游记而言,其中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几乎占整体的三分之二),明治和大正时期即大致相当于晚清民初时期的尚有许多遗漏。这固然由于这一时期距今时间久远,不少游记已很难寻找,一些书甚至已成孤本。而且收藏者又很复杂,除图书馆或特殊文库外,尚有不少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因此,全面收集这些

游记本身甚为困难。可喜的是，日本游摩尼(ゆまに)书房于1997年出版了由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后作为其续篇又相继出版了《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收录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游记65种，其中包括一些世人所不易看到的珍贵资料，大大方便了读者。但这套四十卷本的中国见闻录集成也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游记的精选本。笔者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日本人所写中国游记的收集和考察，目前我个人收罗或目睹的仅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大大小小已不下三百余种，以后将择其精者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

前面提到，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1871年的订约建交。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策的打算，较之中国人，日本人在交流之初就显得异常积极主动。与迟迟至1877年末才派使团进驻日本相对照，1872年初开始，日本即先后开设上海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品川忠道)和福州福州领事馆(领事井上让未赴任)，同年8月，政府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我国东北侦探考察。早在前一年政府就派福岛九成等九人赴中留学。1873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美代清元中尉等八名陆军留学生赴中。1874年8月在北京北京设置公使馆，并开始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牛庄领事馆和芝罘领事馆也先后开设。同时期，与日本的出兵台湾台湾相呼应，大批军人进入台湾台湾和大陆，从事侦探和调查活动。1875年2月，受政府委托，三菱商会开通横滨横滨至上海上海间的定期航路，投入“东京东京丸”等四艘汽船，开始每周一班的航行。同年8月，共同运输公司又开通日本—芝罘—天津天津—牛庄间不定期航线，大

大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渡航。

日本政府及其后援组织或企业的这些举措,无疑鼓励和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进出。因此,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来观光旅游,有的是来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来求学或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所闻或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下来,有的已公开刊行,有的尚未正式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以上这些我们统称之为游记。

当然这些游记中,有的内容比较肤浅,价值不大,有的甚至是作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偏见和谬误甚多。但其中也有许多颇有价值者。不少书不仅详细描述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及物产,而且还记录了作者所拜会的知名人士的逸事,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在华机构以及日本国内的学校修学旅行团等,其中留下游记最多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该校每年都组织毕业生分班前往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区。作为义务,回来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书,如《旅行纪念志》(1911)、《孤帆双蹄》(1912)、《乐此行》(1913)、《沐雨栉风》(1914)等,即第8期至11期学生的调查旅行记。东亚同文会于1916年至1920年出版的十八卷本《中国省别全志》,就是根据该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汇总编辑而成的。目前国内已出版了几本这方面的译稿和著述。

出自个人之手的游记为数最多。以明治、大正时期为例，这些撰写者从身分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官僚或政治家。如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5月从北京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陕西，进而翻越秦岭，横断栈道难关进入成都、重庆。后乘舟下长江，过三峡，8月抵上海上海。其将此次历时百余日的长途跋涉以优雅的汉文写成《栈云峡雨日记》刻印出版。卷首尚有李鸿章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所作的序。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大鸟圭介《长城游记》(1894)、黑田清隆《漫游见闻录》(1888)、村木正宪《清韩纪行》(1900)、米内山庸夫《云南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年版，实为1910年之行)等。

第二、学者及记者、编辑。这类游记较多，如曾历任过《大阪朝日新闻》、《台湾台湾日报》、《万朝报》等报社记者或主笔、后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内藤湖南湖南于1899年9至11月游历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地区，并与严复、方若、文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面笔谈。事后写下游记《燕山楚水》(1900)。另有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1884)，尾崎行雄《游清记》(1884)，户水宽人《东亚旅行谈》(1903)，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1906)、《中国漫游记》(1918)，桑原鹭藏《考史游记》(1942年出版，实为1907—1908年之行)，竹中清《蒙古蒙古横断录》(1909)，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1911)，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1918)，川田铁弥《中国风韵记》(1912)，那波利贞《燕吴载笔》(1925)等。

第三、作家或艺术家。如曾被胡适称为“新派小说家”的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于1921年3月末至7月初，前来中国。从上海上海登陆后，先后游历苏杭、南京南京、九江、汉口汉

口、长沙长沙等地，然后经洛阳至北京北京，最后由天津天津经沈阳、朝鲜归国，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华期间还拜访过章炳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并在游记中分别记下了对前四人的访谈录。后结集出版的《中国游记》(1925)，即这位年轻作家留下的民国 10 年时的中国印象记。这类游记还有：鸟谷又藏《中国周游图录》(1914)、夏目漱石《满韩漫游》(1909)、河东碧梧桐《游中国》(1919)、佐藤春夫《南方纪行—厦门采访册》(1922)、木下太郎《中国南北记》(1926)等。

第四、教习及留学人员。清末学堂聘请日本教习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教习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遗产。如北京北京东文学社教习高濂敏德的《北清见闻录》(1904)、先后在陕西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和湖北武昌陆军小学堂担任过教习的小山田淑助的《征尘录》(1904)、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3)等。留学人员的游记有从师于俞樾的井上陈政的《西行日记》(1883)、后藤昌盛的《在清国见闻随记》(1884)等。这类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的留学时的身分是学者，则列入第一类型，如桑原鹭藏、宇野哲人等。

第五、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如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于 1874 年为筹备军需物品被派往上海上海，两年后又派到中国从事谍报等活动，1878 年回国后向政府献上《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其后又多次潜入中国侦探调查。《清国漫游志》(1874)、《北中国纪行》(1875)等，即其游历之记录。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岛弘毅《满洲纪行》(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

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吉田平太郎《蒙古蒙古踏破记》(1927年版,实为1919年内蒙古蒙古东部及洮南地区的旅行日记)等。

第六、实业家或商人。如:实业家木村市《北清见闻录》(1902)、古董商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1899)、设立图南商会的阿川太良《中国实见录》(1910)、曾担任过日本邮船公司上海上海支店长的永井久一郎《观光私记》(1910)、在天津天津经商十余年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山本唯三郎《中国漫游五十日》(1917)等。

第七、宗教界人士。自古以来,中日宗教界的交流与往来就十分活跃,以鉴真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实。但到了近代,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日本佛教徒主动打入大陆的所谓“中国开教”。1876年8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上海开设其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其实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和尚小栗栖香顶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大陆,后以留学身分在北京北京龙泉龙泉寺从本然本然师学北京北京话。《北京北京纪游》和《北京纪事北京纪事》(1873)即其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西藏旅行记》(1904)、橘瑞超《新疆探险记》(1912)、来马琢道《苏浙见学录》(1913)、大谷光瑞《放浪漫游记》(1916)、青木文教《西藏西藏游记》(1920)等。

第八、儒学者及民间人士。如与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等驻日使馆人员交往甚密的儒者冈千仞,应王韬之邀,于1884年5月至翌年4月前来中国巡游观光。他以上海上海为据点,先后游历苏州苏州、杭州等地后,又北上天津天津、北京北京,最后入广东广

东，经香港回国。其每到一处，必求见当地官绅名流，阔谈时局和救国之策，先后拜访过李鸿章、盛宣怀、俞樾、张裕钊、袁昶、李慈铭、张焕纶等知名人士。其撰写的《观光纪游》(1886)是了解中法战争开战前后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状况的绝好材料。另外，山本梅崖的《燕山楚水纪游》(1899)也是这类游记的代表之作。这里的两部纪游与前面提到的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被称为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汉文体中国游记。

这些游记本身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分多样，动机不一，因此不应猝然定位，亦难于一概而论。但如果把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话，那么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国游记则多属后者。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是我们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而且，这些游记多配有图画、照片等，非常珍贵。这是同时代中国人写的“东游日记”中所少见的。

我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说，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

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11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国漫游实记》（1892）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1871年至1920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1862年“千岁丸”航渡上海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考虑到这是日本开国后第一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土地，并留下的见闻录，故一并收录进来。

在收集和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并痛感到这样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对于小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并明白自己，了解并熟悉对方，同时吸取教训，重视积累，日求进步，是何等重要之事！相信贤明的读者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诸多启发和思考。这也是笔者企划和编选这套丛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

张明杰

2006年10月于东京

译者前言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等身,尤以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著称于国际汉学界。他一生为学,近者追随其师狩野直喜的治学风范,远者景仰清代乾嘉学者的精神性格。在中日战争的年代,他远离弥漫日本全国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气焰,埋首于学术研究。晚年以“城市儒者”自居,表现了对于中国儒学文化和中国文学“日常性”的终身向往。在这一意义上,他的学生高桥和已总结他的学术研究是“儒家的文化研究法”,其学术热情背后是“人格化的哲学”。他的著作有众多单行本问世,后被编成《吉川幸次郎全集》。

一

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吉川在北京度过了将近三年的留学生涯。

在此之前,他曾于1923年春,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他怀着中学毕业刚刚考上京都大学的愉快心情,独自一人游览了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中国南方城市,19岁少年敏感的心被美丽的江南景物所深深陶醉,不由得深情感叹道:“中国,天生是我的

恋人！”

吉川留学北京，寄宿在东城区演乐胡同唐家专门延纳日本留学生的延英舍，同住的同学有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京都大学有关中国研究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都被派往中国留学进修，这成了京都大学中国学的一种传统，日本国内各种奖学金保证着这一传统事业的进行。如佐藤广治、吉川幸次郎、木村英一、小川环树获上野奖学金，小岛祐马、仓石武四郎获文部省奖学金，还有水野清一等人获东亚考古学会的奖学金，先后来中国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在某一方面卓有成就的中国学研究者。

在北京，吉川和仓石先用约半年的时间每天学习汉语，上午是跟随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读解《红楼梦》，下午是练习会话。一年后，吉川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陈衍以及中国大学吴承仕的课，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吴梅等先生问学。就这样，他广泛接触了相关专业教授们课内课外的学术风采和治学特点，也为他日后与中国学者保持长时间的学术交流和友谊，奠定了基础。

课余，吉川一有时间就去琉璃厂、隆福寺的各家大小书肆，访书买书，不仅访求到不少日本罕见的珍贵汉籍古本珍本，而且与当时的一些书店老板也成了朋友。

三年的留学生活，培养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国情结。这一时期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吉川不仅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取鉴于中国，而且，在衣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误认作是中国人。在中